

外国

军事文学

译丛

战争中没有女性

〔苏〕斯·阿列克茜叶维契 著

吕宁思 译



WAIGUO JUNSHI
WENXUE YICONG

昆仑出版社

外国

军事文学

译丛

战争中 没有女性

〔苏〕斯·阿列克茜叶维契 著

吕宁思 译

WAIGUO JUNSHI
WENXUE YICONG

昆仑出版社

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ИЕВИЧ
У ВОЙНЫ—НЕ ЖЕНСКОЕ ЛИЦО

根据«ОКТЯБРЬ»1984年2月号译出

• 外国军事文学译丛 •

战争中 没有女性

〔苏〕斯薇特兰娜·阿列克茜叶维契著

吕宁思 译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 印张 $8\frac{1}{4}$ · 插页 2 · 字数 156,000

1985年9月第1版·198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9,000

书号 10282·4 定价 1.30元

目 次

- “我不想回忆……”…………… (10)
- “再长长吧，姑娘……你们还嫩呢”…………… (26)
- “只有我一人回到妈妈身边……”…………… (58)
- “我们这幢楼里有两场战争……”…………… (82)
- “电话听筒可射不出子弹……”…………… (91)
- “我们只获得了小小的奖章……”…………… (106)
- “那已经不是我了……”…………… (125)
- “我现在还记得这双眼睛……”…………… (136)
- “我们没有打过枪……”…………… (154)
- “关于一丁点儿大的小土豆……”…………… (183)
- “妈妈，爸爸——是什么？”…………… (211)
- “我拯救了生命……我拯救了和平……”…………… (237)

关于女性，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可以用“仁爱”一词来作最贴切的概括。当然，还有别的词汇，譬如：姐妹，妻子，朋友等等，而最崇高的一个词是——母亲。然而，在这些词汇里，“仁爱”难道不是作为实质，作为宗旨，作为根本意义而存在的吗？女人赋予生命，女人捍卫生命，女人和生命就是一回事。

在本世纪最为残酷的那场战争^①中，女人不得已而成了军人。女人不仅包扎救护伤员，而且也打伏击，扔炸弹，炸桥梁，捉“舌头”，侦察敌情。女人杀人了。但她们杀的是敌人，是那些以罕见的残忍蹂躏她们国土、践踏她们家园、虐杀她们孩子的敌人。“杀人，这的确不是女人的本份”，——本书的一位女主人公说。在这句话里她道出了往事全部的恐怖和不可避免的严酷。本书的另一位女主人公则在德国国会大厦的残垣断壁上写下几个大字：“我，索菲娅·孔采维奇，到柏林来，是为了消灭战争。”她们为胜利的祭坛奉献了极大的牺牲。随着一年又一年和平岁月的

^① 指苏联人民反法西斯卫国战争。——译者注

逝去，我们对于她们的不朽功绩，对于这功绩的全部深蕴，才越来越理解了。

在国立“十月革命”中央档案馆，在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卷宗里，保存着尼古拉·列利赫于一九四五年五月至六月间的几封信，在其中的一封信里，他写道：“牛津词典收入了一些俄语单词，并使之成为目前世界上通行的正规词汇，例如，‘指令’和‘苏维埃’等。应当再收入一个词汇，一个无法翻译、包涵着多层含义的俄语单词——‘功勋’。别看它普普通通，可是在欧洲所有国家的语言里，却没有一个在意义上哪怕与之稍稍近似的词语……”有朝一日，俄语中的“功勋”这个词在世界上通行起来，那么其中就有战时苏联妇女的一份功劳。是她们肩负起后方的重担，是她们保护了下一代，是她们和男人一道为祖国而战。

……整整四个春秋，我踏在被别人的痛苦回忆所炙热的万里行程上，倍受煎熬。我记下了上百名在前线战斗过的妇女的叙述，她们当中有医务人员、通信兵、工兵、飞行员、狙击手、步兵、高射炮手、政工人员、骑兵、坦克手、空降兵、水兵、调度员、司机、野战洗衣工、炊事员、面包师等，还收集了女游击队员和女地下工作者的材料。“简直找不出哪一种军事岗位没有我们英勇的妇女参加，而且她们干得决不比她们的兄弟、丈夫和父亲逊色。”——苏联元帅А.И.叶廖缅科这样写道。在这些姑娘们中间，有坦克兵里的团小组长，重型坦克的驾驶员，也有步兵中的机枪连长、冲锋枪手。而在我们俄语里，诸如“坦克手”、

“步兵”、“冲锋枪手”等词汇历来都是没有阴性的，因为这类行当还不曾有女人承担过。

“列宁共青团一发出动员，就约有五十万少女参军，其中有二十万女共青团员。由共青团委派的女团员，百分之七十在主力部队。整个战争期间，在前方各军兵种服役的妇女超过了八十万……”（《苏联的妇女》）

游击战是全民性的。“仅在白俄罗斯的游击队中就大约有六万名勇敢的苏联女爱国者。”（《纪念白俄罗斯从德国法西斯占领下解放三十三周年论文集》）而每四个白俄罗斯爱国者中便有一人被法西斯活活烧死或枪杀。

数字统计就是这样。我们已经明了。但是在这些数字的背后，还包藏着许多被战争糟蹋扭曲的命运和生活：失去亲人，损坏健康，守寡和做老姑娘，痛不欲生的战争回忆——对于这些，我们却了解得太少太少。

我想谈谈她们，四一年的姑娘们。确切地说，是她们自己谈自己，谈她们“自己的”战争。

“能够跟别人谈谈自己的战争经历，我真高兴。”——塔玛拉·伊拉利奥诺夫娜·达薇多维奇（上士，司机）对我说。

“当我对您谈从前发生的一切时，那简直没法活，谁都是这样。我会大病一场的。当年我从战场上活着回来，虽说不过负了点伤，可是却病了很久，到最后我强迫自己，把所有的往事都彻底忘却，不然我永远不可能真正恢复健康。我甚至心疼您，您年轻轻的，却还了解那些伤心事……”柳鲍芙·扎哈罗夫娜·诺维科（准尉，卫生员）

又对我这么说。

我属于战后出生的一代人，这时战壕已经填平，士兵掩体也已覆盖，三层木顶的掩蔽部早被拆除，丢弃在森林里的士兵钢盔完全锈蚀了。然而战争的死亡气息真的与我的生活绝缘了吗？我们大家毕竟还属于这样几代人，战争还欠着我们每个人一笔帐。我的这个家族在战争中丧失了十一个人：乌克兰族的外祖父彼得罗死于布达佩斯城下；白俄罗斯族的祖母叶芙多基娅死在受到饥饿和伤寒困扰的游击队里；我的两家远亲，大人孩子一起被法西斯活活烧死在我的故乡、戈麦尔州彼特利科夫区柯马洛维奇村的茅草棚里；大伯伊万，一个志愿兵，一九四一年失踪……

所以说，这采访的四年就是“我的”战争。我时常胆战心惊，痛苦万分。不，我不能说假话：这条漫长的路我实在走不下去。有多少回，我想忘却听到的一切，但又欲罢不能。在这段时间里，我每天记日记，我决心把日记也编进我的叙述里。日记中有我的感受，我的体验，也有地方志——足足有上百个城市、集镇和穷乡僻壤呢。说实话，我犹豫过很久：我是否有权在这部书里写什么“我感受”、“我痛苦”、“我担心”之类的话？我的感受、我的痛苦能与她们的感受和痛苦同日而语吗？人家会对我的感受、疑问和采访发生兴趣吗？然而，讲义夹中的资料积累得越多，信心就越足：文献，只有当它不仅记载了事件，而且能使人了解当事者本身时，它才具有重要价值。任何见证都不可能毫无感情色彩，其中都含有笔者或隐或现的真情，而

这种真情本身在若干年后也就成了文献。

既成事实的是，我们对于战争的印象，以及我们对战争的全部概念，都跟男人有关。这固然可以理解：打仗嘛，主要是男人的事情。但与此同时，这也等于承认了我们对战争认识的肤浅。当然已有上百部描写参加卫国战争的妇女的作品问世，另外还有不少文献性的回忆录，证明我们女人曾身经壮观的历史事件。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过如此众多的女性参加战争。古代有过几位女性传奇人物，例如女骑手娜杰日达·杜洛娃，女游侠瓦西利莎·柯申娜。在国内战争年代，红军中也有妇女，但大多数是护士和医生。而在卫国战争中，全世界都看到了大批苏联妇女保卫祖国的卓越表现。

当年普希金在《现代人》杂志上刊出女骑手娜杰日达·杜洛娃的札记片断，并在按语中写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个年轻少女，上等贵族的大家闺秀，离开温暖的~~家庭~~，女扮男装，去承担连男人都畏惧的艰难责任，出现在战场上呢？（对手是谁？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大军！）什么事情激怒了她？是难以启齿的家庭纠葛？炽烈的幻想？桀骜不驯的天性？还是爱情的召唤？……”这儿只说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命运，尚且留有很多不解之谜。至于八十万妇女在军中服役，以及更多的妇女申请上前线，那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她们上前线，是因为“在我们看来，我们与祖国已融为一体。”——高射炮手季洪诺维契说。她们被批准上了前

线，因为历史的天平正处在紧要关头：民族、国家是生存还是灭亡？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本书里究竟收入了什么内容，遵循的又是什么原则？——书中讲的不是著名的女神枪手，也不是功勋显赫的女飞行员或女游击队员，这些女性的故事已经写过不少了，我今天有意避开她们的名字。“我们都是些平平常常的女兵，象我们这号人太多了。”——我不时听到这种话。但我恰恰对她们感兴趣，找她们采访。正是在她们的意识里保存有我们可以崇敬地称之为“人民情感”的东西。

“一旦用我们的眼睛，女人的眼睛，来看待战争，战争简直比任何什么都要恐怖。”中士卫生员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米舒钦娜这么说。这个经历了整个战争的普通妇女，直到战后才出嫁，生养了三个孩子，如今已在照看孙子了。她的话概括了本书的主题思想。

光学理论中有个术语叫做“光强度”，即物镜捕捉并固定影像的能力。女性对战争的回忆，就是集中了感情和痛苦的最高的“光强度”。它感情炽烈而昂扬，浓缩了详情细节。而文献正由于其翔实才具有不可估价的力量。

女通信兵安东尼娜·费多罗夫娜·瓦列格冉尼诺娃曾在斯大林格勒城下作过战。她在讲述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艰苦日月时，怎么也找不出恰当的词句来形容当时的体验和感受，后来，她猛地把所有感受都倾注到这样一段话里：“我只记得一次战斗。牺牲的人太多了……遍地都是，就象犁铧从地里翻出来的土豆一样。那么一大片平展展的

田野……他们躺在那儿，仍保持冲锋的姿态……多得就象土豆呵……象马这样懂礼貌的动物，平时走路连腿都不敢高抬，以免碰到人，而到那时连它们也不害怕踩到死人了……”女游击队员瓦莲京娜·巴甫洛夫娜·柯热米雅金娜还记得这样一个细节：战争初期，我军艰难地边打边撤。她那个村的男女老少都出来为部队送行。她呢，和母亲站在一起。“有个上了点岁数的老兵路过时，在我家茅屋前停下来，站得笔直，向我妈妈深深地鞠了一躬说：‘真对不起您，大妈……靠您来保护这姑娘了！唉，只好靠您来保护这姑娘！’我那时才十六岁，有一条很长的辮子……”她还想起了另一件事情：她第一次救护伤员，趴在伤员的头上痛哭，那伤员在弥留之际对她说：“你要好好爱惜自己，姑娘。你还要生儿养女……瞧，多少男子汉战死了……”

女人的记忆往往能捕捉住战争中的基本感情，而这种基本感情常常会被男人们所忽略。如果说，战争以其军事行动使得男人难以忘怀的话，那么女人则是用她们女性心灵的特殊方式体验和承受战争：轰炸、死亡、苦难——在女人眼里这远不是战争的全部，除此之外，由于她们女性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女人们更为强烈地感受到战争在肉体和精神上强加给她们的不堪忍受的重负。她们接受“男性式”的战争生活要困难得多。她们所牢记的、从地狱般苦境中带来的一切体验，在今天已成了难能可贵的精神表率，人的无限潜力的表率。这种表率我们绝无权利将其遗

忘。

在这些叙述中，专门的战争资料也许少了些（不过作者并没有给自己提出这种任务），但是在叙述中却有关于人的丰富资料。正是这些资料，证明了苏联人民如何最终战胜了德国法西斯。要知道，为了使所有的人，使全体人民赢得胜利，每一个人都必须艰苦奋斗才行。

她们还活着，当年战斗的参加者们。但人的生命不会永无终止，唯有记忆可以使生命得到延续，唯有记忆能够征服时间。那些经历了伟大战争、并且赢得这场战争的人们，直到今天才清楚地意识到他们那时的作为和经历所具有的意义。她们愿意帮助我们。我时常在她们家里看到薄薄的学生练习本或厚厚的通用笔记本，上面都是为留给子孙后代们而密密麻麻写下的话。这是祖父祖母们的遗产，当然不愿意传到外人手里。他们常常用不约而同的话来解释：“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回忆留给孩子们……”，“我可以让您抄，但这原本要留给我儿子……”

其实，记下来的也并非全部。很多材料失散了，无影无踪了，被遗忘了。若要记住战争，就会产生很多仇恨。可是如果忘掉战争，战争就会卷土重来。——这是先人的话。

汇集在这里的女人们的故事描绘出了这场战争的全貌：其中完全没有女性的面孔。这些故事就是见证，控诉昨天的法西斯主义、今天的法西斯主义和将来的法西斯主义。这是母亲、姐妹、妻子们对法西斯主义的控诉，是女人对法西斯主义的控诉。

我跟前正好坐着这样一位女性，在向我娓娓讲述。就在战争爆发前夕，母亲还坚决不许她独自一个人去看外婆，说她“还是个小丫头”。可是只过了两个月，这个“小丫头”就上了前线。她成了一名卫生员，跟着部队从斯摩棱斯克一直打到布拉格。回到家才二十二岁，她的同龄人都还是天真烂漫的小姑娘，而她已是见多识广，饱经风霜的人了：负过三次伤，有一次伤得很重，而且伤在胸脯上。还有两次是震伤，最后那次是别人把她从炸塌的战壕里挖出来的，从此她的头发全白了。可她还得开始过女人的生活啊，于是重新学着穿轻纱连衣裙，穿轻便鞋袜，出嫁，养孩子。要是男人，哪怕他打完仗回来成了残废，终究还是能建立家庭。可女人在战后的命运就悲惨了。战争夺走了她们的青春，也夺走了她们的丈夫——年龄相仿的男子从前线回来的不多。她们不用算就知道这一点，因为她们记得有多少男人长眠在被重型炮弹深翻过的战场上。她们简直无法相信，无法忍受这种念头：那些身穿水兵呢的魁梧小伙子们再也不会站起来了，他们将永远安卧在阵亡将士公墓中——在那儿，躺着的是她们的父亲、丈夫、兄弟和未婚夫啊。“这么多的伤员，好似全世界的男人都受了伤……”阿纳斯塔西娅·谢尔盖耶夫娜·杰姆琴科（上士，护士）说。

这样吧，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讲述：她们，四一年的姑娘们，是怎样的人，她们是怎么奔赴前线的。让我们与她们一起，把她们的遭遇重新经历一遍吧。

“我不想回忆……”

这是座落在明斯克近郊的一幢三层旧楼房，属于那种战后迅速出现的建筑群，周围早已长满了优雅的茉莉花。我从这幢房子开始的采访，持续了四年，直到现在，我写文章这会儿，采访还没有结束。说真的，当初我决没有料到结果会是这样。

把我吸引到这儿来的，是该市报纸上刊登的一条简讯，报道不久前在明斯克一家叫“突击手”的汽车厂里，人们欢送会计师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莫罗卓娃退休。报上说，她在战争中曾当过狙击手，十一次荣获战斗奖章。在一般人想象中，很难把这个妇女的军人身份与她在和平环境中的工作联系起来。但就是这种不协调的感觉已经隐约暗示出对如下问题的答案：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战士？

……这是个瘦小的女人，象少女一样把长辫子楚楚动人地盘在头顶上，一点都不象报上登出的那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她坐在一把大圈椅里，双手捂住面孔，说：

“不，不！我不想回忆……神经根本受不了。至今我还看不得战争影片……”

接着她反问道：

“干吗要来找我？您可以去跟我丈夫谈嘛，他可以给您讲好多……指挥员叫什么名字，将军叫什么名字，部队的番号是什么，他全记得。可我不行，我只记得我自己。我的那些事呀，象钉子一样钉在心坎里……”

她请求把录音机拿开：

“我得瞧着您的眼睛谈，这玩意会妨碍我的。”

可是不多一会儿， she 就把录音机的事儿给抛到了脑后……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莫罗卓娃（当时名叫伊万努希金娜，上等兵狙击手）：

“我的故乡在狄雅柯夫村，就是现在莫斯科的普罗列塔尔区。战争爆发时，我还不满十八岁。我进了集体农庄，又修完了会计学课程，以后就开始工作了。同时，我们还在兵役委员会举办的训练班学习。我们在训练班里学会了实弹射击。这个由四十人组成的班里，我们村有四个人，邻村有五人。总之，每个村都有一些人来学习，而且全都是女孩子……男人凡是可能的都上前线了……”

“不久，共青团中央号召青年们挺身保卫祖国，因为敌人已经逼到莫斯科城下。不单是我，所有的姑娘都表示了上前线的愿望。我父亲已经打仗去了。本来我们还以

为，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才积极要求上战场……可是我们来到兵役委员会时，看到已经有很多姑娘在那儿了。挑选很严格。首先，必须得有健康强壮的身体。我担心他们不要我，因为我小时候常常闹病，体质很弱。其次，如果想参军的姑娘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也会被拒绝，因为不能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后方。幸亏我还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虽然他们全都比我小得多，反正条件是够了。最后还有一桩麻烦事：集体农庄主席不同意放我们，如果我们全都离开集体农庄，田里的活儿就没人干了。总而言之，我们是被拒绝了。我们一起到共青团区委去，到那儿也碰了一鼻子灰。

“于是我们以本地区代表团的身份去找州团委，还是没被批准。后来我们决定，既然我们在莫斯科，干脆就到共青团中央去。我们当中派谁去报告？谁有这个勇气？后来我们想，索性大伙儿一齐去吧。可是，我们连团中央走廊都挤不进去，更别说见到书记了。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都集中在这里，其中很多人还是从敌占区来，他们是突围出来为死难亲人报仇的。

“到晚上，我们总算见到了书记。他问我们：‘怎么，你们连枪都不会放，就想上前线了？’我们告诉他，我们已经学会了……‘在哪儿学的？……学得怎么样？……你们会包扎吗？’您知道，就是在兵役委员会举办的那个训练班，地区医院的医生也教过我们包扎。这下好了，我们手里有了王牌。我们还告诉他，我们不仅是这几个人，总共

有四十多人呢，全都会射击，也掌握了初步的医疗知识。书记最后对我们说：‘回去等着吧，你们的问题将会妥善解决。’过了整整两天，通知书到了我们手里……

“我们去兵役委员会报到，在那里我们被带进一个门，又被带进另一个门。我原来有一条非常漂亮的辫子，我一直为它感到自豪。可是等我走出兵役委员会，它已经不在……衣服裙子也收了上去。我都来不及把裙子、辫子给妈妈送去……她多希望在身边保留一些我的东西啊……我们当场就换上了套头军服，戴上了船形帽，领到了背包，然后被装进了运货列车……”

“我们不知道我们将编入哪支部队，也不知道火车载着我们朝哪个方向开。说到底，我们对于干什么工作根本就不在乎。只要是上前线就行。大家都在作战，我们也要作战。我们开到了谢尔柯沃车站，离它不远是一所女子射击培训班。原来是要把我们派到那儿去。”

“学习开始了。各种条令我们都得掌握。警卫勤务、纪律条令、原地伪装、化学防护。女孩子们个个都很努力，我们学会了闭着眼睛装拆‘狙击枪’和确定风速。捕捉移动目标、测定距离、挖掩体、匍匐前进等科目我们也全掌握了。在结业考核中，我的兵器作业和队列作业都得了‘全优’。我记得，我最苦恼的是紧急集合，五分钟内就必须收拾完毕。我们把长统靴按尺码排列成一、二、三、四号，好尽快穿上，以免耽误时间。五分钟时间里，必须穿好衣服、皮靴、并且进入队列。常有这种情况，我们只好光着